

作答案的人。

當時由於不採用學分制，上午四節都是寫筆記，下午三節都是實驗，由於設備齊全而豐富，實驗可以一直做到九點鐘，唯一苦惱的是每年要寫一篇自傳，送到瀋陽的日本特務機關審查，以嚴格考察思想，在這一段不見陽光的日子裡，除了勤學而外，不敢有任何戶外行動。

(三)苦難與磨煉，殷勤「助教經」

日本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發動空襲珍珠港，展開了太平洋大戰的序幕。本來應該在翌年三月畢業的班次，提前三個月於十二月廿七日畢業，日本學生除了兩名因身體不合標準留校任助手外，全部入伍當兵。那老師是中國學生惟一被允許留校任助手（助教）的人。助教工作自同月廿八日開始，除去偶而星期六下午搭車回到相隔二百華里的開原城省親，星期日晚上便要回到瀋陽而外，很少有機會在家住過幾天。助教時期經過了一番嚴格的督責，做一個老鼠般的小沙彌外，一切都要請命而行，無個人自由之可言。教授雖然很嚴厲，却得到了科班出身的嚴格訓練。（關於助教的甘苦談，那老師曾於三年前寫過一篇「助教經」，說明這乃是比就學時更為嚴格的考驗階段，其成敗與否及能否由助手步向教授的坦途，其關鍵就在於能否貫徹這一苦熬時期。由於「大東亞戰爭」方熾，生活困苦，祇好在三十三年兄弟二人雙雙辭職返回開原老家，開設了一間「那氏醫院」，哥哥任眼科醫師，弟弟任藥劑師，兼辦總務、買藥、納稅等一手包辦。

草創之初，藥局部分親自設計，預備製劑親手調製，規模初具，並自製蒸溜水，調製眼藥水以及開刀用的麻醉藥注射劑，這乃是開原城內唯一由藥劑師設計而主持的藥局，半年之後，工作已就緒，便開始了日以繼夜的「錫伯部族誌略」的撰寫。

(四)勤攻錫伯史，戰後逢浩劫

在滿大任助手時期，曾借閱「學籍簿」，把自己的成籍錄下了，保存至今。表中除學業成績外，對於操行方面的考語：「有好學心，好讀書

。「純滿洲人」。所謂「純滿洲人」，當時把所有的東北人都叫做「滿洲國人」，因為是東北的土住部族人，在戶籍上稱為「其他滿（錫伯族）」，「其他滿」者乃指為滿洲族之旁系，學校當局可能是因為那姓，是滿族中之著姓，而認定為滿族人的緣故，其實那老師是滿族中的錫伯人。某日偶然與指導教授佐藤文比古先生談起，他說：「你姓那，當然是滿洲人了。」本人當時答以：「我實在是滿族中的錫伯人。」沒有想到佐藤先生這位藥學家、醫學博士，對於錫伯人是抱有濃厚興趣的研究家。他立即說：「當時」在滿洲的日本人，知道錫伯人的還很少，從事研究的人更不多。滿洲的一二十種少數部族，大都有中文、日文、俄文的研究文獻可稽；惟獨錫伯族，還沒有一部正式的研究報告和書籍，由於指導教授佐藤文比古先生對於錫伯人是抱有濃厚興趣的研究者，於是把自己數年來所蒐集錄自東北各地方志的錫伯族有關資料見示。那老師就本人來說，乃是第一次見到這些錫族文獻和滿文，因而將這本筆記借來，予以抄錄。在當時研究自己種族的歷史，抱有種族觀念，似乎也有「思想不良，反滿抗日」之嫌，於是在筆記本的首頁用毛筆寫上「滿洲醫科大學附屬藥學專門部助教授佐藤文比古先生」，作為擋箭牌。於是從故鄉向外祖姑家借到了一部東華錄，費了一年多時間，把半年的記事編為二卷的三百年滿清歷史瀏覽一遍，遇到有關錫族記事便予摘錄，遇有須詳加考察的地方，註明年月，請佐藤先生到瀋陽的滿鐵圖書館，借來以半月的記事編為一卷的殿本「滿洲實錄」予詳考後來才知道，原來這位講授分析化學、儀器藥品化學，每日進行植物研究的藥學家，竟然是一位「滿洲通」，具有俄語二等翻譯，蒙語、滿語三等通譯的資格。曾前往瀋陽郊區的「三統碑」地方採集藥用植物標本（因當有「靖安軍」駐在那裡，「滿洲國人」是不敢冒然前往的），發現了原已輪在地上已被浮土掩蓋了的石碑，竟然就是埋沒了三百年的創製滿文的學者之一的「達海之碑」，達海在清太祖時期，仿蒙古文字製作了「老滿文」。碑文的正面用滿文，後面用漢文，因而佐藤先生不但發現了達海之碑，

並發現達海的墳墓。藥專主事（主任教授）山下泰藏先生與佐藤先生，曾考據盛京通志所載的達海墓碑原文與滿文核對，發表了一篇專文於「滿洲史學會雜誌」。後來把這一石碑運到市內三經路的「國立博物館」（原為熱沙省長湯玉麟將軍的住宅）長期保存。

錫伯族的史料，經過不斷的蒐集，並前往開原城西鄉間錫伯村屯訪問，蒐集了故老傳聞，錫伯喇嘛廟、以及年紀在五十歲以上仍然使用着的錫伯族語言。以一個廿幾歲的藥師，而研讀清朝歷史，所能領會的成分不多，當時所寫的筆記原稿，自不能說是成熟的，這些資料至今仍然保存在手邊。到了卅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抗戰勝利，東北重新掛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真是萬感交集！首先看到的是蘇聯的兩百輛美式配備的吉普車和八百名俄軍，從鮮卑利亞一直開赴旅順。接踵而來的是戰車，巨砲和俄國部隊。

五月一日，我重新離開了殘破的家園，來到瀋陽，回到母校。這時滿洲醫科大學由交通部與教育部聯合接收，改稱國立鐵路醫學院。一時還很紊亂，日籍教授由於生活不能安定，都打算回國。這時的「藥學專門部」，九十二名日本學生已先後回國，中國學生殘餘四名，由於不穩定，很有被取消的可能，由於同學會的斡旋，把從日本回國的學生，以及長春大學醫學藥學科的學生，介紹到校插班，真是有了四十多名學生。七月，徐誦明博士接任院長才改稱國立瀋陽醫學院，逐漸走上了正軌。當時，滿大藥專有十幾位畢業同學在瀋陽，分別到各大藥廠擔任指導員，以避免在混亂期間被破壞劫收（當時俄軍在重要工廠，前門貼封條，後門搬機器，零星物件要無知的老百姓搶走，拍製新聞片，製造口實。）因而留在母校的起初祇有我一人，其後，校友們從各地回到母校的約達十餘人，分別擔任講師助教，才真穩定下來。卅五年年底，改稱藥學專修科；卅六年春，由於師生共同請命，改為四年制，接着於卅七年春，改稱藥學系。最後於教育部朱部長關先到校視察之際，接受了學生的請求，終於使即將畢業的第一屆學生，得到了藥學士學位。

卅七年春，大局逆轉，學校在大砲聲中上課，瀋陽周圍，祇殘餘幾個縣份還在國軍掌握之中

，家人逃來了瀋陽，米珠薪桂，不能不謀出亡之計，遂於五月十日搭上了民航飛機忍痛離開了母校，於六月十四日輾轉來台，日籍教授們也都先後回國。

我於重返國立瀋陽醫學院之後，改入了生藥學教室，初任助教，在恩師東大夫博士指導之下，開始了兩個月的生藥解剖學基本操作演習。這時東先生正忙於其十年來在東北辛勤的成果「撰寫東北產烏頭附類之生藥學研究」主論文，給我一個研究題目，是「東北產玉竹黃精之生藥學研究」，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，因為隻身在瀋，除去東先生上課時擔任翻譯（藥用植物學、生藥學、藥學拉丁語，和佐藤潤平教授的植物分類學）以及學生實習而外，整天坐在研究室裡伏首切片，晚飯後仍然回到研究室來，工作每至更深，然後再回到單身宿舍。回想當年，真是非常難得的際遇，睡在牀上，一閉上眼睛，出現在腦海裡的都是花花綠綠的細胞。

(五)一心攻本草，輾轉來台灣

卅六年，升任了生藥學講師，是年冬，開始聽本草大師，岡西為人博士的本草概論講義。「當時聽講的祇有七個人，東先生、兩位郭姓助教、三位做畢業論文的四年生和我」。岡西先生當時年已五十，雖然白髮蒼蒼，然精神很好，講授的透闢，給我極深的印象，使我深深地感到研究中國藥材，如不先研讀本草，實在是隔靴搔癢。可惜三十七年五月就離開了母校，沒有聽完岡西先生的講義。

卅七年五月十日，到達了北平，特地去拜謁我國的生藥學大師趙燦黃先生。趙先生住在東皇城根，此時已離開北大藥學系的教授職務，而擔任了北平陸軍總醫院上校藥局主任了。一套綠色的棉軍服，一口江蘇武進鄉音，藹然可親的一位長者。大門掛着「趙氏生藥化學研究所」的招牌，走進了二門，升堂入室，但只見明窗淨機，書齋裡除去琳瑯滿目的本草藏書而外，就是各式顯微鏡和學術論文，從晚上七時許，一直談到深夜十一點鐘。使二十九歲的晚生後輩，祇有必恭必敬地洗耳恭聽。老先生親手交給我厚厚的幾篇大作，保存至今已裝訂成冊。還記得當時講的主要

話題是「生藥與國防」，談到一個日本人僑居在中亞，處心積慮地想偷取山道花的種子，工作了十五年，終被發現而被驅逐出境的趣聞。若不是兵荒馬亂，我很可能決定留在老先生身邊，努力學習生藥學和本草學了。

卅七年六月十四日，舉家來到台中，由於老學長黃順記博士的幫助，住在他和美鑽的房子裡兩個多月，以後才遷居台中市。八月，由於李學長紹唐博士的推介，與家兄一同進入了台北陸軍總醫院，家兄任中校眼科主任，我任少校司藥。十月初，由於母校電召，辭職隻身去北平，為的是協助母校遷來台中，不料到達北平的第四天，瀋陽即以淪陷聞，使設在王府井大街的「國立瀋陽醫學院駐平辦事處」的五百多名教職員生進退維谷，萬不得已隻身又復搭乘軍船於十二月四日在滄沽上船，八日回到基隆，結束了有名無實的四個月（九至十二月）的生藥學副教授生涯。

三十八年二月，重新回到陸軍總醫院，充任了司藥上尉，住在北投分部。十一月一日，由於周菁柏博士的延用，到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服務，任藥劑師六年一個月。於四十四年十二月，由於許鴻源博士的引用，來到台北，任台灣省衛生試驗所藥動課技正，專門從事中國藥材的真偽鑑定，前後工作將近九年。其間曾一度任內政部衛生司幫辦兼代藥政科長，五個半月後重新回到衛生試驗所。

(六)中國醫藥學院，轉瞬一十五年

四十七年，中國醫藥學院成立，受董事長覃醒羣先生之聘，前來台中，協助第一班學生入學考試的監考。

四十八年十二月，由於覃先生與周院長慶光先生的一再要請，前來本院講授藥學系第一屆學生的本草講義，未幾，兼任了本系系主任。「同時被我一直拉夫拉了來的，是甘教授偉松先生和許教授喬木先生」。

四十九年辭去系主任職務，改為兼任教授。五十四年七月，從日本歸來，復任專任教授迄今。

四十九年，受聘為台北醫學院兼任教授，五十年改專任，講授生藥學迄今。五十二年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，兼任實業計劃研究所教授在農學

門、藥用植物組講授本草學和生藥學迄今。

回憶在衛生試驗所期間，九年以還，曾訪問全省各地中藥店三百餘家，環省採集調查，訪問山產行、中藥加工工場、粉末加工廠以及中藥批發店，走遍了寶島的山村，對於本省的中藥生產事業，有了整體的了解。為了「山藥」的辨偽，工作了兩年，才得到結論。剛剛完成了山藥的簡易鑑定法，一下子台北市衛生院捉到了偽山藥兩萬餘公斤，展開了山藥研究的序幕。由此為研究真正山藥的原植物與加工方法，七年以來，去恆春、屏東山地村各四十餘次、嘉義二十餘次、田中、赤水亦不下二十餘次。找到了盛產山藥多達十種的山地村，學會了排灣族的各種山藥土名。辛勤勞作的結果，才完成了「台灣產山藥之生藥學研究」。五十三年十二月，負笈日本，到京都大學藥學部生藥學講座進修，於五十四年三月，通過了論文和考試，倖獲京大藥學博士學位。四五兩月間，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考查錫伯族歷史文獻四十天，很想再拿他一張文學博士的「學位記」（博士證書），然時不我與，實在是異想天開了。六七兩月，去大阪的塩野義製藥研究所，研修學習山茶化學成分的提取操作，兩個月裡用掉該公司數十升的有機溶媒，這些都是岡西先生的提拔，因為民營公司的研究所是不容外人進去的。

塩野義製藥研究所，是容納七百餘員工的七層大廈，三十多個研究室，遠比任何一所藥科大學為宏大。該公司的油日農場，有規模極大的設備，單單大量種植各國山藥就有三十多種，動物飼育場，飼養動物二萬多頭。工作人員四十餘人，飼料加工工場，自動生產飼料，毛地黃粉末加工工廠，由鮮葉到粉末，連續操作二個多鐘頭就生產一批，可見其設備之完備了。如此設備，未悉在國內何時得以實現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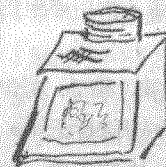
回顧九一八時，年方十四；八一五時，年已廿八，二十九歲來台，庸庸碌碌已二十多年。指導碩士論文三篇，本草及生藥學論著六十餘篇，所教出來的學生估計已有二千人，歲月蹉跎，殊乏成就，五十四年一篇流水帳，如此而已。



藥事法規

與藥劑師

羅澤霖



臺灣地區，近年以來，烈性傳染病幾近絕跡，國民平均壽命延長據統計分析；男性已達六十六歲餘，女性則至七十二餘歲，揆諸原因，實賴醫藥事業進步，衛生行政措施適切，有以致之。亦洗淨「東亞病夫」之譏，此為醫藥衛生行政執業人努力心血結晶之成果，誠堪自慰慰人之快事。然刻下醫藥事業，已否達到盡善盡美境界，尙屬疑問，猶待檢討，以求改進。筆者忝為藥劑師之一，從事衛生行政及教育有年，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旨，爰將平日心得、領悟、體驗，就藥事方面之管見及一得之愚，略加申論。

臺灣在日據時期，實行殖民地政策，罔顧國人健康，業有製藥工業，迨光復後初期，千頭萬緒，對藥事未遑重視，直至四十八年，成立製藥廠先後三十餘所，嗣後如雨後春筍，逐漸發展，至六十年調查數字，已達七百五十餘所，一其中含西藥廠三九四所，中藥廠二九一所，及其他藥工廠，一營業額達十餘億，外銷有十餘國家，可見製藥工業具有相當基礎，於此數百所製藥廠中，其設備完善，着重品質管制，提高製藥水準者，固有人在，而粗製濫造，魚目混珠，祇知圖利

，不顧法令規定，工商道德者，亦屬不少，各市縣鄉鎮藥房，相繼林立，已達近千即有藥房一所之飽和點，兼之日據時期，遺留之西藥種商、臨時西藥種商、成藥調製商、藥品客售商、臨時中藥商、中藥種商、成藥攤販之類藥品業者，及無照藥商等，均無法納入合法藥商，使劣藥偽藥禁藥充斥櫛陳，市場混亂，彼時台灣省藥劑師公會，鑒於此種畸形狀態，意欲舉辦正規藥品與偽藥劣藥對照展覽，使大眾有所鑑別抉擇，但因攸關國家體面，而未果。地方政府，針對此惡劣現象，亦嘗頒佈多種法規，加以整理限制取締，以挽救頹風，奈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來收實效。顯示台灣藥事，有「多」「雜」「亂」特殊現象之謔稱，倘任其泛濫，為害國民健康，不知伊于胡底。因此；政府於五十九年八月，頒佈藥物藥商管理法。於六十春擴大衛生行政機關編組，以適應時代需要，成立衛生署，主掌全國醫政，而藥政為衛政重要之一環，設有藥政處，負責策劃推動全國藥事行政，就藥物藥商管理法中所授權，訂定各種子法，及內政部前頒有關法規草案，共二十二種，經邀請各關係機關代表，多次開會研討，整印精簡為十四種法規草案，其中重要者，如藥物藥商管理法施行細則，毒劇藥名稱表，生